

英國非農業工人的失業問題及其救濟

工作 (1795—1850)

張秀蓉

工業社會中，失業是非常嚴重的一項社會問題。在前人的著作中，對英國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失業問題，已有過相當的研究。唯獨對1850年以前英國工人的失業問題，就筆者所知尚無專門性的文章或書籍討論。依筆者之見，主要是受材料的限制所致。然筆者始終以為，欲探討工業社會中的失業問題，非從工業革命開始時談起，否則不能了解該問題的完整性。本文之作，是想彌補這個缺憾。惟文獻及所能應用的原始材料有限，因此只能算是一種初步的嘗試。

在進入正題前，先將「失業」及「失業者」兩個名詞加以界定。失業 (**unemployment**) 是指勞工市場中，勞工的需要與供應不能協調所發生的一種現象。這種現象具有兩層意義：第一，它不僅指勞工的數量，也指勞工的素質而言。第二，不僅指所有行業的勞工需要與供應量的總數，也指各行業需要與供應的個別量而言⁽¹⁾。失業者 (**the unemployed person**) 是指一個有工作能力的人 (**an able-bodied**)，由於一些他本人稍能或完全無法控制的因素如：經濟秩序 (**economic orders**) 的不能協調及一些人為因素等，使其無法在本行中獲得受僱機會或得到合理工資的受僱⁽²⁾。

嚴格說來，如根據上述失業及失業者的定義，失業問題並非工業革命以後才發生的問題。英國在十四世紀中葉，封建制度已接近尾聲；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工人從此獲得了自由；另一方面，他們也失去了過去封建主對他們經濟上的安全保障，諸如失業、疾病及年老無力工作的保障等等⁽³⁾。另外，歐洲從十一世紀商業復興以後，遠途貿易 (**long-distance trade**) 也漸漸在南北歐分別以威尼斯 (**Venice**) 及布魯日 (**Bruges**) 兩地為中心展開。與此遠途貿易有互為因果關係的是資本主義式的工業 (**capitalistic industry**) 生產的出現。這種新的生產制度與舊有的以及當時並存的，以工匠行會 (**craft-guild**) 為基礎的生產制度有顯著的區別。對工人而言，其中最重要的區別是，在資本主義式的生產制度下，工人不是小企業家，而是受僱於商人製造家 (**merchant-manufacturers**) 的僱工，他們為遠途貿易而生產，不受行會的限制及保障，因此很容易受到戰爭、天災以及任何可影響國外市場蕭條因素的影響而失業。中古時代的後期，毛紡織工業的生產，主要是屬於新生產制度下的生產工業。從十三世紀開始，毛紡織工業主要分佈於低原國家 (**Low Countries**) 以佛蘭德斯 (**Flanders**) 及布拉崩 (**Brabant**) 為主；十四世紀轉到了義大利北部，而以佛羅倫斯 (**Florence**) 為主；

十五世紀就轉到了英國⁽⁵⁾。因此至遲從十五世紀開始，英國的毛紡織工人已開始面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些問題，失業問題即為其一。

雖然失業並非工業革命以後才發生的問題，但工業革命却加速了失業問題的嚴重性。本文擬分為兩個部份來討論。第一個部分，將以英國為例，說明工業革命加速了英國失業問題的嚴重性。第二個部分，是介紹官方與非官方對失業工人的救濟。文中救濟（**relief**）一詞的含意，係指政府、社會團體以及一些慈善家，以金錢、物品或服務方式去接濟無收入或收入無法獲得最低生活所需者的行為而言。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受工業革命影響較大的非農業工人（**non-agricultural workers**）。地區是限於英格蘭與威爾斯兩地。研究的時間是1795—1850。因為1905年英國政府正式頒佈失業工人法案（**Unemployment Workers Act**）以前，對於失業者的官方救濟工作，主要是根據救貧法（**Poor Law**）來處理；而在英國救貧法的歷史演變過程中，1795年的斯賓漢蘭法案（**Speenhamland Law**）是一重要的轉捩點。又1850年以前，非官方的失業救濟主要是以工人的自助組織為主要機構。這些工人自助組織，到十九世紀中葉，都已有了相當的發展。如其中的工會（**Trade Unions**）組織，到1851年工程師同業公會（**Amalgam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成立以後永久性而成功的工會組織才在英國發展起來。此後，英國工人才有了具體的組織，對外謀求工人的政治、社會地位及權利；對內解決工人自身的問題，失業即為其中之一。因此本文的研究止於工人自助組織到了相當發展的程度以前。1850年以後的英國非農業工人的失業研究，多少已有資料便於研究了。

部份壹：失業問題

第一節 工業革命以前非農業工人的失業問題

工業革命發生於何時，以及是否應該用工業演化（**Industiral Evolution**）取代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一詞是研究工業革命的學者們爭論不休的問題。在此，筆者不擬贅述這些爭論。本文所稱工業革命，其發生的時間係指十八世紀的第三季。工業革命以前，製造業、商業及城市，在英國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本文所指的非農業工人，是農業工人以外的工人階級，包括磨坊工人，礦工，家庭手工業工人，工匠〔包括主匠（**masters**），手藝工人（**journeymen**）及學徒（**apprentices**）〕以及一些非熟練工人⁽⁶⁾。

概括地說，失業按性質分，可分為四種：偶發性失業（**casual unemployment**）

), 季節性失業 (seasonal unemployment), 週期性失業 (cyclical unemployment) 以及技術性失業 (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工業革命以前, 這四種性質的失業, 在英國都已經發生了。

從工作性質來看, 不論工業革命以前及以後, 偶發性失業及季節性失業都會威脅某些非農業工人。例如: 由於工作的季節性以及每年工作的勞工需要量不同, 建築工人、煤礦工人、裁縫師等, 常會面臨季節性失業。另一類工作, 如碼頭工人, 他們的工作是受需要的時間限制, 以天為受僱單位, 因此碼頭工人及類似性質的工人常會有偶發性失業的威脅⁽⁸⁾。週期性失業是經濟波動引起的。如前述, 英國至遲自十五世紀開始, 毛紡織業的工人已經會受到戰爭、天災及任何能導致國外市場蕭條因素的影響而失業。如1528年, 英王亨利八世 (Henry VIII), 因失去佛蘭德斯市場, 向查理五世 (Charles V) 宣戰, 使得英國的織工受到失業之苦⁽⁹⁾。更何況, 自十五世紀開始, 百年戰爭, 宗教戰爭, 為爭奪殖民地的戰爭頻頻發生。工人所受的影響必將更大。技術性失業, 是因為生產技術的改良, 使得原來在舊生產技術線上的工人失業。工業革命以前, 生產技術的改良, 雖然不比工業革命以後發生多、變化大, 但技術性失業仍然發生在工業革命以前。如英國的毛紡織工業, 在其發展過程中, 毛織品漂洗的機械化, 即以瀑布為動力, 推動蒸洗機 (fulling mill) 取代過去用人的腳力踏洗毛織品的生產技術改進, 結果發生腳力漂布者 (foot fuller) 的失業, 並且失業者提出抗議⁽¹⁰⁾。

很遺憾, 工業革命以前, 非農業工人的失業數字及比例, 沒有一個確實記載, 前人的研究中也無資料可供參考, 因此在這裏不能描述工業革命以前失業問題的嚴重性為何。

第二節 非農業工人的興起

工業革命的本身是一系列的並且是相互影響的技術改變⁽¹¹⁾。但它却影響到生產量由小規模改變到大規模的生產, 生產的組織由家庭生產制度演變到工廠生產制度, 生產方式由手工轉到機器生產。這些在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改變, 導致了經濟快速成長以及許多政治性、社會性等的結果⁽¹²⁾。為切題起見, 在此只討論人口中職業分配的改變以及工人階級結構的改變兩項。

工業革命以後, 英國人口的職業分配比較傾向非農業工人數目的增加。1830年皇家委員會的一項調查報告中特別指出非農業工人增加的情形。

1801年, 英國人口中務商及製造業者與務農者的比例為6比5。1821年, 該項比例為8比5。現在(指1830年), 也許是2比1弱一點⁽¹³⁾。

在這些非農業的從事者中, 有一羣新人興起, 即近代的工廠工人。工廠工人是來自

過去鄉村的家庭手工業制度下的工人，鄉村的農人、工人，從工作屋（Workhouse）招來的孩童以及一些工匠（artisan）⁽⁴⁾。隨着工廠制度的興起以及工業的擴張，工廠工人的數字增加很快。如以棉織工業為例，在1830年代，工廠工人數目已超過手搖紡織機的工人。根據渥德氏（C.H.Wood）的推算，1806年時，受僱於棉織工業的工廠工人是90,000人，手搖紡織機的工人是184,000人。1834年開始，工廠工人開始超過手搖紡織機工人，其人數分別為215,000人及200,000人。1850年則分別為331,000人及43,000人⁽⁵⁾。棉織工業在工業革命前期是主要工業。從該項工業的工廠工人與手搖紡織機工人數字升降關係，也可引伸到其他工業的一般現象，更何況工業革命之後還有許多新興工業，其工人更是傾向於工廠工人。

從工人階級的結構來看，工業革命以後，非農業工人不僅分為熟練工人與非熟練工人，而且也可分為工廠工人與非工廠工人。熟練工人中，一些工人在工廠中工作，有些則在家中從事生產；但有些工廠中的熟練工人如工匠，他們的身份是重疊性的。

工廠工人中還有一個重要的現象，即童工與女工是構成工廠工人的主要份子。從下列表一得知成年男工在棉織、絲織、麻織以及相關工業工廠工人中所佔比例：1835年為23.1%，1838年為22.6%，1847年為27.7%，1850年是26.6%。所以成年男工幾乎僅佔所有工廠工人的四分之一。

表一：受僱於棉織、絲織、毛織、麻織以及相關工業工廠中年齡及性別的分配表，1835—1850（數字以千為單位）

	13歲以上童工		13—18歲童工		成年工		總數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835	27.8	29.5	46.1	64.4	78.1	92.1	338
1838	16.2	15.9	62.9	94.9	99.9	134.2	422
1847	23	19.9	63.5	100.6	138.5	198.5	500
1850	20	20.6	68.2	159.6	380.4	596

資料來源：1836年以來各工廠監督間歇性開會報告。轉引自B.R.Mitchell, *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88, 199, 204, 211

以上所討論的是工業革命以後，非農業工人的興起，尤其是工廠工人的逐漸增加，為不可忽視的趨勢。在工廠工人中，童工、女工所佔的比重又是值得注意的事實。本節討論的兩個重點，將有助於次兩節檢視工業革命後非農業工人的失業問題並比較工業革命以前及以後失業問題的嚴重程度。

第三節 工業革命以後非農業工人的失業問題

工業革命如上所述是一系列的並且是相互影響的技術改進，因此工業革命以後，技術性失業算是很明顯的一種社會現象。正比如威瑞基氏（W. H. Beveridge）所說：

當工業成長時，某一些特別的行業，將趨於衰微，或是在生產方式與組織上有所改變。那些依賴這些特別行業為生的人，將發現他們那種特別的以及辛苦學來的技術在新的市場上會變成一種絆腳石。而他們也可能永遠的被隔離於新的職業之外。因為他們的年紀及知識，使他們無法去從事一種新的職業⁽⁴⁾。

不僅如此，人力與機器在生產方式上的競爭，也影響到人力生產者，如手搖紡織機工人的逐漸被淘汰，即為明顯例子。「每一架動力機器（power-loom）的生產量，至少相當於三架手搖機器（hand-loom）的生產量」⁽⁵⁾。換句話說，機器愈改進，每一工人的生產量也愈高；相對地，機器的改進也減少了同量生產的勞工需要量⁽⁶⁾。

更進一步說，在機器生產方式下，有些工作是童工、女工都能像成年男工一樣操作。在這種情況下，僱主自然寧願僱用童工及女工。因為童工、女工的工資比成年男工工資低得多。例如，根據1830年皇家委員會對製造業者僱用工人的調查報告得知：以曼徹斯特（Manchester）為圓心，半徑三十哩的範圍內，棉織工業工人的工資是分作四等的。第一等只有男工，週薪20先令。第二等包括男工及女工，週薪是12先令。第三等也包括男工及女工，週薪7先令。第四等包括男工及女工（其中包括八歲以上童工），週薪只有2先令6辨士⁽⁷⁾。從該項報告，雖無各等級男工女工人數的比例記載，但至少從第一等全男工及第四等男工、女工（包括童工）工資的對比，20先令比2先令6辨士，也可獲知在工資方面，男工確是比女工童工高。這也許可以解釋第二節所述，男工僅佔工廠工人四分之一比例的原因之一。由於過份地僱用童工、女工，對成年男工的勞工市場來說是相當不利的。

第二種失業是週期性失業。1850年以前，經濟蕭條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英國發生。根據哈布士邦氏（E. J. Hobsbawm）的研究，英國在1850年以前經濟蕭條的年份是：1811—1813，1815—1817，1819，1826，1829—1835，1838—1842，1843—1844，1846—1848⁽⁸⁾。在這些年份中，呈現的共同現象是物價漲高，工資降低以及失業率增加。

在經濟蕭條期間，非農業工人的失業情形，從一個在利德斯（Leeds）工作的羊毛工人羅傑遜氏（Joseph Rogerson）的日記可見一斑。

1808年 5月

5日：我們的工廠停工，沒有工作。

7日：貿易情形到了壞得不能再壞的地步，並且錢很少。

10日：這個星期，我們的工作情形很好。

18日：今天工廠停工……去河中釣魚，以消磨時間。

20日：今天下午工廠停工。

24日：工廠停工。

25日：今天的工作很少……我們發現許多能力強的人，週薪只有10。

過去這些人的週薪是25到30。（原文未註明幣值。筆者按，根據前述棉工週薪的幣值，此處之幣值應為先令。）

26日：無所是事。工廠停工。

28日：工廠停工。解僱我們之中許多人⁽²¹⁾。

通常，在滯銷的短暫經濟不景氣期間，除了失業工人外，在工廠工人中尚有兩種受僱情形。第一種是完全受僱（**full employment**）。第二種是部份受僱（**partly employment**）。部份受僱又分兩種情形。一種是工人工資的支付是論件計算，其酬勞接近完全受僱時的標準。但是每週只有3天到4天有工作，其餘日子的生活必須自謀解決。另一種是工人的工作，在量方面如同完全受僱時一樣，但工資是降低了。這兩種部分受僱，工廠主人會任擇其一。當短暫的蕭條期過後，任何一種部分受僱都會被取消，再恢復過去的完全受僱，工人的損失並不很大⁽²²⁾。同樣地，當經濟不景氣時，這種部分受僱，也會發生在非工廠工人身上⁽²³⁾。

至於週期性的失業率，波拉德氏曾作過研究。他指出1842—1843年經濟不景氣時，在製造業分佈區，有21%工作了12年以上的工人是完全受僱，43%的工人是部分受僱，36%的工人是失業的⁽²⁴⁾。從波拉德氏的研究，顯示週期性失業對非熟練工人的威脅比熟練工人要大。例如：謝菲爾德（**Sheffield**）這個古老而且擁有工匠比例很高的市鎮，在1842—1843年經濟蕭條期間，工人失業的情形與前述數字的對照是：19%，63%，12%。僅有12%的工人失業⁽²⁵⁾。

除技術性與週期性失業外，偶發性與季節性失業，在工業革命後，依然發生。但引起偶發性失業的原因比工業革命以前為多。例如，在工廠中工作的工人，意外事件及受傷是非常普通的⁽²⁶⁾。當意外事件發生或受傷後，工人工資被止付，廠方也無醫藥上幫助。換句話說，當工人遭受意外或受傷，亦同時面臨失業⁽²⁷⁾。另一種普遍現象是罷工或社會暴動，在工業革命後較工業革命以前發生更多。當罷工或社會暴動發生時及發生以後

，不論工人參與與否，他們都會遭受失業的不幸⁽²⁸⁾。

最後，尚有兩種失業情形也是同樣會發生在工業革命以前及以後的。第一種是，在散作生產制度下（**Putting-Out System**）的製造業主，或工廠制度下的廠主，可以很輕易地解僱工人，而且是憑自己的喜怒以決定解僱與否，受僱者毫無工作安全感可言⁽²⁹⁾。尤有進者，僱主甚至利用解僱工人作為他們停止工人罷工的利器，直到1830年代，這項武器還是很有效地被僱主利用⁽³⁰⁾。第二種是，同一行業工人工作時間分配的不平均，致使一部分工人擁有過量的工作，其他人無工作可作；後者即受到失業的痛苦，這種情形在裁縫業常常發生⁽³¹⁾。

工業革命以後的非農業工人的失業統計數字，從官方的記錄及學者的研究，可得一些資料，除前述波拉德氏所提出的資料外，尚有六個。第一，從議會報告得知，1827年3月25日到1828年3月25日，在部份教區、市鎮，具有工作能力接受救濟的人數為1,437人，佔全部接受救濟人數的28.64%⁽³²⁾。第二，從議會報告得知，1842年報喜日（**Lady day**，按3月25日）前的一季中，成年而有工作能力者，在所有戶內窮人（**In door Pauper**）及戶外窮人（**Out door pauper**）中所佔的比例是27.47%⁽³³⁾。第三，狄紹爾氏（**M. Dessauer**）曾研究1848—1850年間，成年男子具有工作能力，因無工作而接受救濟的數字如下：1848年7月1日是18,085人，1849年1月1日是17,588人，1849年7月1日是8,719人，1850年1月1日是9,314人，1850年7月1日是4,440人。1851年的全國人口普查，全英格蘭威爾斯人口的總數為18,623,000人。所以有工作能力的窮人，因無工作而接受救濟者，與全部人口的比例，按前述的日期，依次約為0.1%，0.09%，0.04%，0.05%及0.02%⁽³⁴⁾。第四，羅撒氏（**Michael E. Rose**）的研究，1840，1843，1846年報喜日前的一季中，所有成年有工作能力而接受救濟者，佔全英格蘭及威爾斯人接受救濟人數的比例分別為20%，16%，18%⁽³⁵⁾。第五，哈布士邦氏的研究，1842年在英格蘭西北的波爾頓（**Bolton**），磨粉匠，鐵匠，木匠，磚瓦匠，石匠，裁縫師，鞋匠等的失業率分別為60%，36%，84%，87%，66%，50%，50%⁽³⁶⁾。第六，哈布士邦氏的另一研究指出，1841—1842在渥斯豪（**Vauxhall**），史托克波特（**Stockport**），科奈（**Colne**），歐得漢（**Oldham**），亞克寧頓（**Accrington**）等地失業率為49.39%，50.45%，47.9%，25.64%，19.01%。部分失業者的比例是12.36%，34.88%，32.58%，25.64%，43.39%⁽³⁷⁾。

以上所列的統計數字，有些是區域性的現象，有些則為對某一時期的研究。雖然從這些描述，我們很難對非農業工人失業情形獲得全貌，但可使我們對工業革命後的失業問題得到部份的認識。

第四節 討論

綜觀前三節所述，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印象：第一，非農業工人的失業問題，同時發生於工業革命以前及以後的社會問題。基本上無法從統計數字來比較工業革命以前及以後的非農業工人失業問題的嚴重程度。因為工業革命以前是沒有統計資料，工業革命以後只有片面統計資料。第二，工業革命以後，英國人口的分配，漸漸傾向城市人口。毫無疑問，城市人口中的大多數份子是非農業工人。而其中的工廠工人正是興起的一羣新人。第三，在工業革命影響下，引起非農業工人的技術性失業機會比以前為大，而且工業革命以後引起工廠工人偶發性失業的因素比以前複雜，因此工業革命以後非農業工人失業的可能率比以前要高。

除了第三點，從引起工人失業的原因看出工業革命以後非農業工人的失業可能率比以前為高外，我們還可從上述第二點着手加以分析及比較。

工業革命後非農業工人中的新興工廠工人，與在家庭中從事生產的工人，有許多不同處。家庭手工業工人，擁有自己的生產工具，在家裏工作，與土地關係甚為密切，而且是散居於鄉村或城市中⁽³⁷⁾。工廠工人中，除第一代尚有25%工人的生活尚部份依賴土地出產外，工廠工人是除自己的身體及工作能力外別無所有，工資成為他們僅有財產，羣居於城市，堪稱為城市的無產階級⁽³⁸⁾。自然地，工廠工人與家庭手工業工人的生產方式是不同的。尤其兩者同時遭受失業威脅時，他們的心理感受也不一樣。工廠工人是毫無依靠，而庭家手工業工人至少還可從土地上獲得一些安全感⁽³⁹⁾。

更且，從杜德氏（A. H. Dodd）對北威爾斯的研究得知，當經濟蕭條時，非農業工人受到痛苦的人數要比農業工人受到痛苦的人數為多⁽⁴⁰⁾。

根據以上兩段分析，我們可以說，即使同樣是失業，同時發生在工業革命以前的社會及以後的社會，其中工業革命以後社會中非農業工人所承受的失業威脅會比工業革命以前的社會為大。這不僅指承受失業的人數，而且也指工人承受痛苦的程度而言；因為工業革命以後，人口的職業分配，比較傾向於非農業人口的增加，而且其中新興的一羣工廠工人，除工資外毫無依靠，不能像工業革命以前或同時存在，人數已逐漸減少的家庭手工業工人，當失業時可回到土地上求取生活。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工業革命雖然使一些工人失去工作機會，如技術性失業者；但它也為工人帶來了一些受僱的新工作機會，如新技術的操作及新興行業像造船業，與經濟發展相關的社會性建設等工作機會。再從政府在救濟金上花費的數字來看：1803年，國家在救濟貧窮（包括失業者及農業工人）上的花費是4,268,000鎊，1851年是4,963

,000鎊。從1803到1851,救濟方面的花費有些波動。但只有四年即1818,1819,1820,1832超過7,000,000鎊。全國人口,1801年時全英格蘭及威爾斯是9,009,000人,1851年則為18,623,000人;其增加率是很平穩地增高一倍⁽⁴¹⁾。以人口的增加率來比較救濟金撥發的數字,可見救濟金的增加率並不如人口增加一倍那麼迅速。雖然救濟金撥發的對象本僅僅是非農業工人,但從整體而論,相去也不會太遠。基於上述兩點,我們可以推測,十九世紀上半期,非農業工人普遍的失業現象是短暫性的而非完全的休閒在家。這種短暫性的失業,是指工人從原來的職業轉向另一新的職業之間所發生的暫時性失業。或是短暫的經濟蕭條所造成,如第三節中分析過的部分受僱或失業情形⁽⁴²⁾。至於十八世紀下半葉,工業革命以後這段期間非農業工人的失業也許比十九世紀上半葉時還嚴重,但並不是本文討論範圍之內了。

部分貳：失業救濟

第一節 時代思潮對失業工人的看法,1795—1850

傳統的觀念,是將失業者視為受處罰者以及個人不能避免的不幸;失業者也是一個窮人(**pauper**)。社會中的高階層人士,有責任,也有能力去僱用、救濟甚至改善社會中佔大多數比例的窮人;窮人則應該附屬於高階層人士。到十八世紀末,這種傳統觀念,漸漸變成了窮人自助的理論。這個理論認為窮人必須依靠他們自己;社會中高階層人士,沒有責任,也不能負起僱用或救濟窮人的責任⁽⁴³⁾。這個新理論是受正統的自由放任思想的影響,也與個人主義的功利學派理論有密切關係。當時的思潮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是經由每一個人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尋求自己的利益而獲得的。」⁽⁴⁴⁾當時中產階級對窮人流行的態度是:「一個勤儉的人能為他自己作的事,社會就不必對他作什麼。任何事可聽任個人的智慧、節儉及努力去解決;而這些美德就能使人有能力去解決疾病、老年及失業的問題。」⁽⁴⁵⁾因此,當我們讀到1841年12月4日在泰晤士報(**The Times**)中描述的一段顯主對不幸失業工人的態度,就不會感到驚奇了。現引如下:

中部諸郡的廠主們……星期日在德貝(**Derby**)開會。這個會被他們稱為大會(**Great Conference**)。該會召集的目的是為了交換穀物法(**Corn Laws**)對製造業影響的資料。在花了一個上午來討論失業工人的不幸後,這些紳士們開始享用皇家旅館的主人所提供的豐富午

宴，以慶祝公衆的不幸，因為是這些不幸，使他們聚集在一起的。⁽⁴⁶⁾這種窮人自助的理論，造成兩個結果。一方面，在舊救貧法的爭論期間，即使仍有一些人，像克拉克遜氏(W. Clarkson)認為救濟純粹是一種道德的責任；拉文斯頓氏(P. Rawenstone)也認為「要求救濟是窮人的權利，樂善好施則是富人的義務」；翰明氏(W. Haming)也堅持救濟的原則聽起來是非常完美⁽⁴⁷⁾，但最後，斯賓漢蘭法案的「生存權利」(right to live)的救貧原則被1834年新救貧法(New Poor Law)的「低於合格能力」(less eligibility)的救貧原則所取代。另一方面，這個窮人自助理論也助長了工人的自助團體的紛紛成立。如：同濟會(Friendly Societies)，工會及儲蓄銀行(Savings Banks)。

除世俗性的思想外，宗教思想也是與失業工人救濟有密切關係的。在宗教復興運動之後，「人人在上帝的眼中有平等的尊嚴；人人也應該被其他人以同樣的眼光對待」⁽⁴⁸⁾，這種觀念漸漸影響人心。幫助比較不幸的人是宗教家的一項活動。例如：在福音運動(Evangelical Movement)下，福音主義派的基督徒，真誠的認為從事慈善事業是他們的責任。通常，商業道德與宗教道德是重疊的。一個虔誠信仰福音主義派的商人，在從商餘暇也參予慈善的活動；同時他的妻子也去看望窮人，並在主日學校(Sunday school)教書或是參予慈善團體的工作⁽⁴⁹⁾。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鼓動下，教徒也有了新的熱誠來擔負教區的救濟義務⁽⁵⁰⁾。基督教社會主義者(Christian Socialist)分別為工人階級的教育及工會而努力。唯一神教派的信徒(Unitarians)幫助工人階級成立合作社及輔助早期的工會運動⁽⁵¹⁾。教友派信徒(Friends)以個人或團體的方式，供給工人階級的緊急需要⁽⁵²⁾。

從上述討論得知，1795—1850年，窮人自助的理論深據人心。但它只影響到救貧法假設的改變，並未影響到救貧法的被廢止。宗教思想推助基督徒負起救濟窮人及解決工人問題的責任。世俗的及宗教的思想都幫助了工人自助組織的成立。

第二節 官方救濟

從歷史的演變來看，1600年前，失業者是被政府視為犯罰者。1600年以後，則被視為窮人。直到1905年失業工人法案的頒佈，英國才將失業者與一般窮人問題分開處理⁽⁵³⁾。因此，1795到1850年間，官方對非農業工人的失業救濟與其他發生意外不幸者、疾病患者、年老無力工作者等等，同樣地按照政府所頒佈的救貧法處理。

1531年英國政府開始負起救濟受經濟蕭條影響者的責任。直到1601年頒佈的貧窮救

濟法案 (Act for the Relief of the Poor)，才具體地將失業工人的救濟納入救貧法中⁵⁴。1601年法案中規定：在每個教區 (parish) 設置一些監督 (overseers) 來執行窮人救濟工作。監督由保安官 (Justices) 任命並受其控制。救濟所需由各地的地方稅收負擔。監督者的職責之一是「為無法為生者及失業者安排工作。」⁵⁵

1602年到1850年，對一個有工作能力者的救濟有四個轉捩點。1722年在顧亞契布爾法案 (Edward Kialchbull's Act) 規定下，教區必須以一個或聯合幾個教區，以建、買或僱的方式成立工作屋。任何不願在工作屋工作者，教區將拒絕施予救濟⁵⁶。1782年，基爾伯特法案 (Gilbert's Act) 則開始鼓勵用戶外救濟 (Outdoor Relief) 的方式去救濟一些不在工作屋工作，而他們的工資又不足維生的有工作能力者。1795年，斯賓漢蘭法案根據人有「生存權利」為原則訂立的。救濟金給予的標準是以麵包的時價及工人家庭的人口來決定⁵⁷。在這個法案規定下，一個有工作能力的人，可經由四種方式獲得戶外救濟。一是津貼 (Allowance)，即教區根據麵包時價及工人家庭的人口訂下最低生活標準。如工人工資不敷此最低生活標準時，教區將以津貼方式救濟該工人及其家庭。二是巡邏者 (Roundsmen)，即教區監督領着失業者，挨門挨戶詢問工作機會。僱主及教區共同負擔該工人及其家庭生活費用。三為勞工價格 (Labour rate)，即教區規定好勞工的工資，將失業工人分配給僱主，僱主有義務僱用失業者。並隨稅率的增高，工資也隨之提高。四為教區本身僱用有工作能力而失業者為教區中的公共事業，如築路、挖掘溝渠等工作⁵⁸。1834年新救貧法建立了「低於合格能力」的原則。對有工作能力的人及其家庭的失業救濟只限於在管理良好的工作屋中執行⁵⁹，即採取所謂的戶內救濟 (Indoor Relief)。

一般說來，1795到1834年之間，官方對非農業工人的失業救濟可分為戶外救濟與戶內救濟。根據救貧法，對具有工作能力者的失業救濟辦法屢有更改，實際上，1834年以前，英國執行救貧法的實際情形是隨地方隨時間而在救濟方式及目的上還是大有區別的。例如1834年，全英格蘭及威爾斯還有五分之一弱的地區是採用1782年的基爾伯特法案的救濟辦法⁶⁰。1831年，全英格蘭威爾斯共有54個郡，15,535個教區，而只有5,748個教區，17個郡是屬於斯賓漢蘭法案執行的教區，僅僅佔全數的35%⁶¹。更且，戶外救濟的方式也隨教區而有不同。根據勃朗氏 (Mark Blang) 的研究，有些教區是以金錢救濟，而有些教區是以物品接濟。有些教區在救濟時，要區別因失業導致的不足收入以及低工資率導致不足收入的兩種不同情況。在有些區域，給予戶外救濟以前，並不查詢接受救濟者的實際收入；而有些區域，給予戶外救濟前，要作查詢工作，但只是根據接

受救濟之前幾星期的收入來計算⁶²。

1834年之後，雖然新救貧法，將全國的救貧事宜，由原來各教區的自行負責轉向中央統轄管理，⁶³但新救貧法的執行仍不能完全奏效。主要原因在新救貧法將失業假定為具有工作能力者自願招來的，認為凡是願意工作者，都能獲得工作。這種假定，對工業工人是不公平的⁶⁴。例如，手搖紡織機工人的失業，並不是他們惰於工作，也不是他們的過錯。關於失業問題，筆者在部分一的第一、三兩節申述過，在此不再贅述。新救貧法的規定，將失業工人聚居工作屋中工作成為唯一的失業救濟方式，對於工業工人來說是一項極惡劣的侮辱⁶⁵。是故，新救貧法不可能在北部製造業區執行⁶⁶。1834年以後，對具有工作能力的失業者的戶外救濟仍然很普遍，特別是在北部製造業諸郡，戶外救濟一直未曾中斷過⁶⁷。

除戶內戶外救濟外，在救貧法的處理下，政府也鼓勵用移民的方式來解決失業者的困難。英國政府頒佈的法令中，第一次直接而具體處理移民問題的是1834年新救貧法。事實上，1834年以前，議會在1819，1821，1823，1825及1827年分別已經撥出50,000鎊，68,760鎊，15,000鎊，30,000鎊及20,480鎊幫助人民移民⁶⁸。一些教區也曾幫助移民。例如，在科斯列（*Corsley*），從1828年就開始幫助失業者向加拿大移民，以解決問題⁶⁹。

根據1834年的法案，教區可撥款幫助移民，而規定每名移民的補助，以不超過十鎊為限⁷⁰。根據詹遜氏（*S. C. Johnson*）研究，1836到1846年，救貧法委員會總共撥出80,000到90,000鎊，以幫助英格蘭及威爾斯的14,000人移民⁷¹。其中幫助的對象，包括農業與非農業工人。

除上述正規的官方救濟外，英國政府，有時也經由或不經下議院的特別投票決定去救濟經濟受難者，包括失業者。如1826年1月1日到1827年9月25日，政府總共撥出26,960鎊16先令5辨士救濟製造業區遭受經濟困難者⁷²。

第三節 非官方救濟

非官方對非農業工人的失業救濟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由慈善機構或慈善家施予的救濟。例如：勞動者友人社（*Labourer's Friend Society*），1830年成立，它的目的是對工人部份受僱或失業期間提供一些物品或錢的支援⁷³。都市行乞社（*Metropolitan Mendicity Society*），1818年成立，宗旨是幫助失業者尋找工作以及供給失業者食物及金錢⁷⁴。無家可歸的窮人救濟院（*Houseless Poor Asylum*），是

倫敦最早的夜間避難所。(筆者按：該組織成立年代不可考，但從史料來源判斷，必在1850年以前成立。)專門對在嚴寒冬季突然遭到失業的工人提供夜間的居所及食物⁽⁷⁶⁾。1817年，鞋匠摩爾氏(**Mr Moore**)撥款100鎊僱用30名值得尊敬的失業者⁽⁷⁷⁾。1826年3月，英國盤碟玻璃公司(**British Plate Glass Co.**)的財產負責人，撥出100幾尼(**guineas**) (按一幾尼相當21先令)救濟在拉文黑德(**Ravenhead**)受經濟災難工人⁽⁷⁸⁾。

第二類是由工人自己組織的互助組織來負責失業救濟。這些組織包括：同濟會，蓄儲銀行，工會及行業結社(**Trade Societies**)。

同濟會，原來是一個火險公司(**Fire-insurance Company**)的名字，以後成為某類工人互助團體的通稱。這類工人互助團體，會員按時捐款，以備入會會員的不時之需，包括患病、殘廢無法工作的津貼、會員死亡時的津貼以及對會員的寡婦孤兒照顧等等。有些同濟會也提供一些福利或服務，包括對失業成員的救濟。同濟會的起源，也許可追溯到中古時期的行會組織，但兩者並未有直接的先後相承關係。同濟會至遲在十七世紀末期開始出現，十八世紀時才廣泛地成立。但初期的組織多為地方性的，會員是屬於同一村莊或市鎮中某一限定範圍之內。組織也微弱，常受經濟蕭條的打擊而解散，也無法律保護。1793年以後，由於法律對同濟會有了初步的保護，所以組織數目增加很快。1801年艾登氏(**Sir F.M.Eden**)作調查時，估計當時約有7,200個組織。同時在十九世紀初期，另外兩種類型的組織出現。一是郡同濟會(**County friendly Societies**)，由鄉區的紳士及教士提倡，包括範圍較廣，通常包括一郡的大部區域在內。一是結社(**Orders**)的興起。如十八世紀中期出現的祕密共濟會(**Oddfellows**)，到十九世紀初期發展很快，中期及後期更成為同濟會的典型組織。一般說來，同濟會的功能與工會的功能很近似的⁽⁷⁹⁾。

蓄儲銀行，在性質上不是為營利的，而是作些慈善性的服務。第一個正式的儲蓄銀行是登堪氏(**R.H.Duncan**)於1810年在蘇格蘭成立。1827年時，登堪氏的銀行被推廣到全蘇格蘭，愛爾蘭及英格蘭。據統計，1859年時共有635個儲蓄銀行，儲蓄額為39,000,000鎊⁽⁸⁰⁾。

工會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期工廠制度在英國發展後，因勞資對立，工人為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謀求自身福利而成立的組織。初起時，如同濟會一樣，是地方性的組織而且組織微弱。1818—1819，1826，1830，1834，尤其後兩次在杜赫提氏(**John Doherty**)及歐文氏(**Robert Owen**)領導下都作過全國性工會組織的嘗試，但都不

成功。直到1851年工程師同業公會成立，全國性的工會才發展起來⁶⁰。

以上三種團體，對其成員失業的救濟方式包括：給付失業救濟金，幫助尋找工作，幫助移民以及同業間的工作等量分配的規定等。最後一項，是特別指裁縫業而言⁶¹。

除上述三團體外，另外還有一種行業結社，是屬於具有學徒以上資格的工人組織。例如毛刷工（brushmakers），印刷工（printers），蒸汽引擎工人（steam-engine makers）等等都有這種組織。通常，每一行業結社，除總部外，各處設有分部。當組織中的工人失業時，組織可資助他們前往他處尋找工作，即所謂的流浪覓職制度（Tramping System）。失業工人，每到一分部，只要出示身分證——證明他在結社中是品德與技術良好者，分部的職員就會招待該失業工人食、住以及給付津貼。每到一處，如無工作機會，則繼續前往他處尋找。支付津貼的方式，按日或按兩地間相隔距離而決定。而分部負責人，將盡量指示到達下一目的地的捷徑。通常支付週末的津貼較週日為高。流浪覓職制度是為工匠的季節性及不規則的失業而設計的。最早出現在1700年，到十九世紀這個制度相當普遍。然而這個制度不適合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所以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流浪覓職制度，不再是純粹地幫助失業者尋找工作制度的制度，比較傾向於發放失業救濟金的制度了⁶²。

第四節 討 論

綜觀第二、三節的介紹，得知1795到1850年之間，官方對於一個非農業工人的失業救濟包括戶外救濟，戶內救濟，與幫助移民等三種方式。非官方救濟方式包括：給付救濟金，幫助尋找工作，幫助移民及同業間的工作量分配等四種方式。現在先來討論官方與非官方的失業救濟的有效程度。

官方的救濟是全國性的，而且救濟金的撥款數，在議會報告中都有記錄。現列表於后：

表二：英格蘭及威爾斯救貧稅收入與救濟金支出表，1803—1850（單位千鎊）

	救貧稅 收入	救濟金 支出		救貧稅 收入	救濟金 支出		救貧稅 收入	救濟金 支出
1803	5,348	4,268	1825	6,972	5,787	1838	5,186	4,124
1813	8,647	6,656	1826	6,965	5,929	1839	5,614	4,407
1814	8,389	6,295	1827	7,784	6,441	1840	6,015	4,577

英國非農業工人的失業問題及其救濟工作

• 15 •

1815	7,458	5,419	1828	7,715	6,298	1841	6,352	4,761
1816	6,937	5,725	1829	7,642	6,332	1842	6,553	4,911
1817	8,128	6,911	1830	8,111	6,829	1843	7,086	5,208
1818	9,320	7,871	1831	8,279	6,799	1844	6,847	4,976
1819	8,932	7,517	1832	8,623	7,037	1845	6,791	5,040
1820	8,720	7,330	1833	8,607	6,791	1846	6,801	4,954
1821	8,412	6,959	1834	8,338	6,317	1847	6,965	5,299
1822	7,761	6,359	1835	7,374	5,526	1848	7,817	6,181
1823	6,898	5,773	1836	6,355	4,718	1849	7,674	5,793
1824	6,837	5,737	1837	5,295	4,045	1850	7,270	5,395

資料來源：議會報告。轉引自Mitchell，同揭書P.410

從表二得知，1803—1850間所列39年中，救濟金的支出均未超過救貧稅的收入。而且在部分一第四節討論中曾提及，十九世紀上半期救濟金的撥發不如人口增加那麼迅速。因此就救濟金收支的平衡而論，救濟金的撥發應該是能解決全國的貧窮問題，包括工人失業在內。但實際上，非農業工人失業時，從政府撥發的救濟金中受益多少？其有效的程度又如何？這是相當難以回答的問題。因為政府救濟的對象包括所有需要幫助的窮人。就以其中失業這項而論，就包括農業工人與非農業工人。雖然勃朗氏曾提出從1802年到1850年，全英格蘭及威爾斯的救貧款項中52.7%是花費在非農業區的諸郡⁶³。在另一研究中也提出1831年全英格蘭與威爾斯人口的73.55%分部在非農業諸郡⁶⁴。如果根據勃朗氏的結論，想從每年對有工作能力失業者所撥救濟金中，推算出政府對非農業工人失業救濟的確實數字，畢竟仍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沒有確實數字，就無法與當時的最低生活所需作比較，也就更無法求得官方的救濟對非農業工人失業救濟，在救濟金額數字方面的有效程度了。但在官方救濟事業中，有一項可以確定的是救濟方式中，戶外救濟對非農業工人的失業救濟為合適的一種救濟方式。因為1834年新救貧法頒佈之後，戶外救濟在北部製造業發達區未曾停止，可以作為證明。

雖然沒有數字的資料可以得知官方救濟對非農業工人失業救濟的有效程度，但是從非官方救濟項中的工人自助組織紛紛成立，而且也負起失業救濟工作，可以推測官方的救濟，對失業的非農業工人來說，也許在方式上，也許在救濟金額上，也許在工人接受救濟的心理感受上是不能達到救濟的有效程度的。

非官方的失業救濟包括慈善團體或慈善家作的救濟以及工人基於互助的意識型態所

組成的諸團體作的救濟。除 E. J. Hobsbawm, P. H. J. H. Gosden, S. Pollard 等的研究中曾提出部分數字⁸⁶，可作非官方對非農業工人失業救濟的有效程度作參考外，無法從救濟金的數字求知非官方失業救濟的全面有效程度。不過由於非官方失業救濟，尤其是工人的自助組織來負責救濟工作，在救濟方式上應該比官方的救濟方式切合實際需要；而在接受救濟者的心理感受上也比被視作一般窮人來對待舒服得多。不過在非官方失業救濟中，我們必須要注意的是1850年以前的工人自助組織，仍是屬於發展時期，其組織各屬地方性的，而且組織微弱。

以上就官方與非官方對非農業工人救濟的有效程度作了分別的討論，現在進一步來檢討官方與非官方失業救濟的有效程度的總值。工業革命為英國帶來許多社會性的結果。英國政府為了解決其中嚴重的童工、女工被剝削，工人過長的工作時間，因此1850年以前頒佈了五個重要法案：1802年健康與道德法案（*The Health and Morals Act of 1802*），1819，1833，1844的工廠法案（*The Factory Act of 1819, The Factory Act of 1833, The Factory Act of 1844*）以及1847年的十小時法案（*The Ten Hours Act of 1847*）⁸⁶。可是對工人失業問題，一直要到1905年政府才頒佈一個具體的失業工人法案來解決嚴重的失業問題。因此筆者推測，1850年以前的非農業工人的失業問題，一方面因為十九世紀前半期普遍的失業現象是短暫性的失業；另一方面即官方與非官方的失業救濟，無論在方式上，救濟金額上，以及接受救濟者的心理感受上其總值尚稱能解決這種短期性的失業。所以，1850年以前的失業問題（包括非農業工人），在引發及助長英國政治及社會不安上扮演重要角色，而失業本身却並不如童工、女工及長的工作時間那麼嚴重⁸⁷。

後記：本文之寫作，承美國伊利諾大學歷史系教授 Dr. John McKay 惠予指導並提出甚多寶貴意見。英文原稿曾經其仔細校讀。本文之材料搜集，得該校總圖書館工作同仁幫助甚大。在此一併誌謝。1973年12月

附 註：

- (1) W. H. Beveridge, *Unemployment*, N.Y. AMS 1930, pp 4,5
- (2) S. H. Patterson, *Social Aspects of Industry* N.Y. & London.: McGraw Book Company, Inc., 1935, p. 271
J. L. Cohen, *Insurance Against Unemployment* London: P. S. king & son LTD., p.29
- (3) Karl de Schweinitz, *England's Road to Social Security* N.Y.: A.S. Barnes and Company, Inc., 1943, pp 2—13
A.C.C. Hill & Isador Lubin, *The British Attack on Unemployment*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34, p. 11
- (4) D. Dillar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mmunity* N.J.: Prentic-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1967, pp.26—30, 34—36
- (5) Dillard, 同揭書 pp.36—42
- (6) De Schweinitz, 同揭書 p.12
Jurgen Kuczynski, *The Rise of the Working Class* N.Y.: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7,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C. T. A. Ray p. 11
- (7) Patterson, 同揭書 p. 272
- (8) 同上
P. N. Stearns, *European society in Upheaval* London: Collier—Macmillan, 1967, p. 36
- (9) De Schweinitz, 同揭書 p. 11
- (10) Dillard, 同揭書 p. 41
- (11) D. S.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
- (12) 可參見 N. J. Smelser, "Mechanisms of Change and Adjustment to Change" in Tom Burns, *Industrial Man* Penguin Books Baltimore, Maryland, 1969, pp. 35—42
- (13) *Parliamentary papers, Report from Select Committee on Manufactures' Employ* 1830, X, No. 590, p. 2
- (14) Kuczynski, 同揭書 P. 68
- (15) B. R. Mitchell, *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598—99

Wood 氏 在此所參考的資料是 *Journal of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910

- (16) Beveridge, 同揭書 p.12
- (17) *Parliamentary papers*, 1830 同揭書 p. 3
- (18) W. T. Colyer, *An Outline History of Unemployment* London: N. C. L. C. Publishing society, p.20 (Year?)
- (19) *Parliamentary papers*, 1830, 同揭書 p.4.
- (20) E.J. Hobsbawm, *The Industry and Empire* N. Y: Pantheon Book, 1968, P. 74
- (21) W. B. Crump. *Leeds Wollen Industry 1780—1820* Leeds: The Thoresby Society, 1931, pp. 84, 85
- (22) *Parliamentary papers* 1830, 同揭書 p. 7
- (23) H. Mayhew,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London: Charities Griffin and Company, 1964, Vol. 11 pp. 335—338
- (24) S. Pollard, *A History of Labour in Sheffield*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39
- (25) 同上
- (26) P. Mantoux,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 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1, p. 413
- (27) *Parliamentary papers, Report of Leonard Honer, Esq., Inspector of Factories for the quarter ending 30th June 1840*, XX111, p. 13
- (28) Mayhew, 同揭書 p. 338
- (29) Landes, 同揭書 p. 56
P. Deane,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50
J. L. Hammond, *The Town Labourer* N. Y.: Anchor Books, 1968, p. 255
- (30) N. Edward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South Wales* London: The Labour Publishing Company (Year?) pp. 88—93
- (31) F. W. Galton, *The Tailoring Trade* London, N.Y., Bombay: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6, pp. 149—202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 Y: Vintage Books, 1963, p. 250, Footnote No. 2
- (32) *Parliamentary papers, Accounts & papers* 1829, XX1 No. 52, pp. 2—3
- (33) *Parliamentary papers, Account & papers* 1843 XLV P. 14
- (34) M. Dessauer, "Unemployment Record, 1848—50" EHR Vol. 10, No. 1, 1940, Feb,

- Mitchell, 同揭書 pp. 20, 6
- (35) Michael E. Rose, "The Allowance system under the New Poor Law" EHR Second Series, Vol. 19, No. 3, 1966, Dec.
- (36) E. J. Hobsbawm, "The British Standard of Living, 1790—1850" EHR Second Series Vol. 10 No. 1, 1957, Aug.
- (37) Kuczynski, 同揭書 p. 15
E. J. Hobsbawm, *The Industry and Empire*, 同揭書 pp. 66—68
- (38) Hobsbawm, 同上
Stearns, 同揭書 pp. 121—22
Dillard, 同揭書 p. 250
- (39) Dillard, 同揭書 p. 121
- (40) A. H. Dod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North Wales*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33, p. 364
- (41) Mitchell, 同揭書 pp. 20, 6
- (42) P. Deane and W. A.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250
- (43) Reinhard Bendix, *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 N. Y. & Evanston: Harper Torchbooks, 1956, p. 73
- (44) A. F. Young and E. T. Ashton, *British Social Work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56, P. 18
- (45) 同上 p. 21
- (46) 轉引自 Jurgen kuczynski, *A Short History of Labour Condition under the Industrial Capitalism* London, 1942, P. 23
- (47) J. R. Poynter, *Society and pauper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 pp. 265, 249, 250
- (48) Young, 同揭書 p. 42
- (49) 同上 pp. 29, 30
- (50) 同上 p. 32
- (51) 同上 pp. 33, 37
- (52) 同上 p. 41
- (53) E. F. Stevenson, *Unemployment Relief: the basic proble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4, p. 5
- (54) 同上 pp. 79, 86

- (55) P. F. Aschrott, *The English Poor Law System* London: knight & Co., 1902, pp. 7, 49
- (56) 同上 p. 16
Mantoux, 同揭書 p. 434
- (57) J. F. C. Harrison,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1780—1960* N. Y., Evanston and London: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5, p. 43
- (58) De Schweinitz, 同揭書 pp. 74—75
- (59) Bendix, 同揭書 P. 96
- (60) De Schweinitz, 同揭書 P. 68
- (61) M. Blang, "The Poor Law Reexamined" JEH Vol. 24, No.2, 1964, June
- (62) M. Blang, "The Myth of the Old Poor Law" JEH Vol. 23, No. 2, 1963, June
- (63) Aschrott, 同揭書 p. 44
- (64) Peter 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N. 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9, p. 212
- (65) Young, 同揭書 P. 48
- (66) Rose, 同揭書
- (67) Young, 同揭書 pp. 47—48
- (68) Stanley C. Johnson, *A History of Emigration From United Kingdom to North America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1913, pp. 19, 2. 8
- (69) M. F. Davies, *Life in an English Village* London, MCMIX p. 80
- (70) Johnson, 同揭書 p. 19
- (71) 同上 p. 89
- (72) *Parliamentary Papers, Report: Commissioners, Appendix B Tables & Returns* 1844 XIX p. 285
- (73) Young, 同揭書 p. 85
- (74) Young, 同揭書 p. 86
- (75) Mayhew, 同揭書 Vol. IV p. XXVIII
- (76) Young, 同揭書 p. 87
- (77) T. C. Barker & J. R. Harris, *A Merseyside Tow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t. Helens 1750—1900* London: Frank Cass & Company LTD., 1959, pp.205-206
- (78) Judith B. Williams, *A Guide to the Printed Materials for English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750—1850* N.Y., 1926, pp. 274—275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33, Vol.

IV p. 547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William Benton, Publisher, Chicago, London, Toronto, Geneva, Sydney, Tokyo, Manila, 1959, Vol. 9, pp. 843—844

(79) Williams, 同揭書 p. 289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同揭書 1968, Vol. 19, pp. 1108, 1111

(80) Williams, 同揭書 pp. 306—309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同揭書 1968, Vol. 13, pp. 554, 557

(81) P. H. J. H. Gosden, *The Friendly Societies in England* N. Y.: Augustus M. Kelley Publishers, 1967, pp. 55, 62, 69

Barker, 同揭書 p. 261

Dodd, 同揭書 pp. 404, 373

C. R. Fay, *Life and Labou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20, p. 62

S. & B. Webb, *Industrial Democracy*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20. pp. 152—172

Johnson, 同揭書 p. 51

Galston, 同揭書 p. 182

(82) E. J. Hobsbawm, "The Tramping Artisan" EHR Second Series Vol. 3. No.3, 1951

(83) Blang, 同揭書 (1963)

(84) Blang, 同揭書 (1964)

(85) Hobsbawm, 同揭書 (EHR)

Gosden, 同揭書 pp. 76—77

Pollard, 同揭書 p. 72

(86) Dillard, 同揭書 pp. 254—255

(87) Colyer, 同揭書 p. 19

W. W. Rostow, *British Econom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8, P. 108

參考資料

議會報告

Parliamentary Papers: Accounts & Papers 1829 XXI, 1843 XLV

Parliamentary Papers: Report from Select Committee on Manufactures' Employ 1830, X

Parliamentary Papers: Report of Leonard Honer, Esq., Inspect of Factories for the quarter ending 30th June 1840, XX III

Parliamentary Papers: Report: Commissioners, Appendix B Tables & Returns 1844 XIX

專 著

Aschrott, P. F., *The English Poor Law System*, London: Knight & Co. 1902

Barker, T. C. & J. R. Harris, *A Merseyside Tow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t. Helens. 1750—1900* London: Frank Cass & Company LTD., 1959

Bendix, R., *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 N. Y. & Evanston: Harper Torchbooks, 1956

Beveridge, W. H., *Unemployment* N. Y. AMS, 1930

Cohen, J. L., *Insurance Against Unemployment*, London: P. S. King & Son LTD.

Colyer, W. T. *An Outline History of Unemployment* London: N. C. L. C. Publishing Society

Crump, W. B. *Leeds Wollen Industry 1780—1820* Leeds: The Thoresby Society, 1931

Davies, M. F., *Life in an English village*, London, MCMIX

De Schweinitz, K., *England's Road to Social Security* N. Y.: A. S. Barnes and Company Inc., 1943

Deane, P.,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At University Press, 1965

Dillard, 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mmunity* N. J.: Prentice-Hall, Inc., 1967

Dodd, A. H.,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North Wales*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33

Edwards, 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South Wales*, London: The Labour Publishing Company

Fay, C. R., *Life and Labou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20

Galton, F. W., *The Tailoring Trade* London, N. Y. Bombay: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6

Gosden, P. H. J. H., *The Friendly Societies in England*, N. Y.: Augustus M. Kelley, Publishers, 1967

Hammond, J. L., *The Town Labour* N. Y.: Anchor Books, 1968

Harrison, J. F. C.,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1780—1960* N. Y., Evanston, and

- London: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5
- Hill, A. C. C., & Isador Lubin, *The British Attack on Unemployment*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34
- Hobsbawm, E. J., *The Industry and Empire* N. Y.: Pantheon Book, 1968
- Johnson, S. C., *A History of Emigration From United Kingdom to North America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1913
- Kuczynski, J., *The Ris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N. Y.: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7.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C. T. A. Ray
- Kuczynski, J., *A Short History of labour condition under the Industrial Capitalism* London, 1924
- Landes, D. 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Mantoux, P.,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 Y.: Harper & Row Publisher, 1961
- Mathias, P.,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N. Y.: Charles Scribners's Sons, 1969
- Mayhew, H.,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London: Charities Griffin and Company, 1964
- Mitchell, B. R., *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2
- Patterson, S. H., *Social Aspects of Industry* N. Y. & London: McGraw Book Company, Inc., 1935
- Pollard, S., *A History of Labour in Sheffield*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59
- Poynter, J. R., *Society and Pauper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
- Rostow, W. W., *British Econom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8
- Smelser, N. J., "Mechanisms of Change and Adjustment to Change" in Tom Burns, *Industrial Man* Penguin Books, Baltimore, Maryland, 1969
- Stearns, P. N., *European Society in Upheaval* London: Collier-Macmillan, 1967
- Stevenson, E. F., *Unemployment Relief: the basic proble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4
- Thompson, E. P.,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 Y.: Vintage Books 1963
- Webb, S. & B., *Industrial Democracy*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20

臺大歷史學報

• 24 •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 第一期

論 文

Blang, M., "The Myth of the Old Poor Law" JEH Vol. 23, 1963

Blang, M., "The Poor Law Reexamined" JEH Vol. 24, 1964

Dessauer, M., "Unemployment Record, 1848—50" EHR Vol. 10 1940

Hobsbawm, E. J., "The British Standard of Living, 1790—1850" EHR 2nd Series Vol. 10, 1957

Hobsbawm, E. J., "The Tramping Artisan" EHR 2nd Series Vol. 3, 1951

Rose, M. E., "The Allowance system under the New Poor Law" EHR 2nd Series Vol. 19, 1966

工具書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William Benton, Publisher, Chicago, London, Toronto, Geneva, Sydney, Tokyo, Manila 1959 & 1968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33

Williams, J. B., *A Guide to the Printed Materials for English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750—1850* N. Y. 1926